

社會主義城市思想與中國 二十世紀城鄉關係的演變

● 姜 進

一 引言

二十世紀的中國，從城戀到鄉愁，是一個本然的過程，沒有人刻意設計或追求。城市化伴隨着現代化、尤其是工業化的進程，緩慢而自然地發生着。中國的城市化率從1900年不到10%，到1978年時不足18%，可見進展之緩慢。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以後，城市化隨着經濟的迅猛發展開始提速，城市化率在短短二十年裏翻了將近一倍，增加到2000年的36.2%^①。但是，城市化的這一加速程度更多只是因為國家管控的放鬆和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國家和社會對城市的總體設想仍然是以控制為主，與之前的三十年相比並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中國城市化的提速雖然開始於二十世紀晚期，但從思想上和戰略上明確將

城市化作為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的重要引擎卻是隨着千禧年一起到來，城鄉關係也從此進入到一個新階段。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第一次超過農村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51.83%，意味着中國城鄉關係發展到一個重要轉折點。到2020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資料顯示，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3.89%，已經進入到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的後半程^②。

我在與美國著名城市史學者羅威廉(William T. Rowe)教授的一次學術對話中，提出一個觀點。十八世紀以來歐洲社會現代化有三個關鍵要素：城市化、民族國家的興起、工業革命。這三個變量在歷史上依次發生，各自獨立卻又互相激盪、競爭、刺激，共同塑造了歐洲的現代性。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在西方的逼迫

* 本文原係一部二十世紀中國城鄉關係史論文集(阮清華、姜進主編：《城戀鄉愁：二十世紀中國的城鄉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的序言，因文章涉及中共城市理論和城市規劃等重大議題而必須送審。考慮到送審批覆過程比較費時，勢必延誤文集的出版，因而撤下。感謝《二十一世紀》編輯部，文章進一步修改後得以在這裏與讀者見面。文章寫作過程中參考了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阮清華二位教授的寶貴建議，上海市方志辦編輯翟輝先生和我的博士生王胡偉同學在資料上提供了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下發生，見證了救亡圖存語境下民族國家的興起和工業化的巨大衝動。與歐洲不同的是，中國的現代化始發之時沒有如歐洲中世紀那樣有着高度發展的城市化這個前提。在整個二十世紀裏，中國的城市化作為一個議題並未受到國人的重視，在思想和實踐中也沒有成為現代化的主要動因^③。城市化一直要等到二十一世紀，伴隨着城市化進程的忽然提速以及對城市及城市化的新認識，才成為經濟社會的一個中心議題而受到普遍重視。城市化不僅成為現代化的標誌和量尺，也成為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並作為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變量，開始參與塑造中國現代化的獨特面貌。城市重新進入了歷史。

城鄉關係裏的一個重要維度，是工業與農業之間的關係。隨着上世紀末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城鄉差別進一步拉大。鄉村的衰落有目共睹，農村、農民、農業成為經濟社會面對的嚴重問題，所謂「三農」問題開始受到聚焦。近代以來，中國農村持續衰落。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城鄉關係和中共「三農」政策的演變大體經歷了三個歷史時期。

1953至1978年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新生的政權首先確定了「高積累、低消費」、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國家工業化戰略，與之相配套的是農業養育工業的國策。經過三十年的艱苦奮鬥，到1978年，形成了比較完備的初步的現代工業體系。

1978年以後，中國進入向國際開放和市場化經濟改革時期。農村率先開始了市場化改革，農業生產力得到激發，農民生活持續得到改善。同時，以鄉鎮企業大發展為契機，城市的工商業也逐步開始了市場化改革，

工業化隨即迅猛發展。這一時期總體實行的仍然是農業養育工業的國策。

進入新世紀，中國經濟步入高速發展時期，以京滬穗深(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為代表的大都市崛起，成為經濟發展的龍頭。中國開始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達到了1,000美元，工業成為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工業反哺農業成為新的國策。在第十個五年計劃(2001-2005)中，第一次全面取消了農業稅以及各種農村集資收費項目，開始反過來實施公共財政對農業的補貼政策。從2004年至今，中共中央連續多年的一號文件都是關於「三農」問題的，對農村採取「多予少取」政策，投入逐年加大。

與此同時，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城鎮化戰略也開始日益清晰起來，從此城市化不再只是經濟社會發展中一個自然發生的過程，而成為中國新一輪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戰略。如董繼紅、賈森概括的那樣，2001年開始實施的〈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提出要『不失時機地實施城鎮化戰略』，首次將城鎮化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以往限制城市規模的城鎮化方針逐步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對城鎮化發展速度的高度重視」^④。該綱要又指出：「有重點地發展小城鎮，積極發展中小城市，完善區域性中心城市功能，發揮大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引導城鎮密集區有序發展」^⑤，這一方針改變了1991年第八個五年計劃裏「控制」大城市、「合理發展」中小城市的提法^⑥。新的城市化藍圖在第十一和第十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繼續發展，日益清晰。2011年發布的〈第十二個五年計劃綱要〉明確提出：「按照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完善功

能、以大帶小的原則，遵循城市發展客觀規律，以大城市為依託，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⑦

綜上所述，中國的城市化從二十世紀裏自然而緩慢的發展，到二十一世紀初突變成為一個具有戰略自覺和強大動能的、追求高速發展的國策。這一轉變的背後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城市問題上的認識轉變。如今的中國，城市化已經成為一股巨大的動能，與民族國家建設、工業化形成三駕馬車，正在共同塑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在此時刻，我們有必要回顧上世紀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前史，以幫助我們對當前問題的理解和思考。

回溯二十世紀初期，清末民初之際，中國步履蹣跚地走出帝制時代城鄉一體的格局，第一次設立了行政市的建制，開始實行城鄉分治。此後，隨着城市現代化的進展，鄉村變化較為緩慢，城鄉差距逐漸形成，城鄉關係的相關動態也成為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學者圍繞着二十世紀中國城鄉關係史，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多有細緻的研究和思考^⑧。在這裏，我聚焦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上海，兼及北京，對共和國早期的城市理論和實踐以及二十世紀城鄉關係的演變作一個粗略的梳理。

二 城市理論

城市理論是關於城市作為人類聚居的一種方式及其獨特空間安排的研究，對於重點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

式的古典馬克思主義來說，城市並非其關注的中心。城市學家帕克(Simon Parker)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前者「並未討論資本主義體系實際運作於其中的〔城市〕環境。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選擇集中精力研究和分析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及其機制，而不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日常生活裏所造成的後果」^⑨。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重要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裏，分析、批評和譴責了資本原始積累下英國工人階級的悲慘狀況，他關注的重點顯然不是城市本身^⑩。古典馬克思主義學者雖然並未否認城市社會的重要性，但城市本身顯然沒有成為他們分析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概念範疇。

中共繼承了古典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傳統，沿用了階級分析框架下城市概念薄弱的資本主義研究。遵循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中共以地主和農民之間的對抗關係為基礎解讀中國農村社會，以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對抗為基礎來理解城市社會。在中共早期以鄉村為根據地的革命戰略中，城市問題和城市理論都還沒有提上日程，還不足以引起中共理論家的興趣。

然而，在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指導下，革命戰爭的進展出乎意料地迅猛，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的短短十四年後，全國勝利已然在望。革命軍隊要進城了！城市問題在中共幾乎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忽然提上了日程。在此重要時刻，中共中央於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了歷史性的七屆二中全會(俗稱「西柏坡會議」)，毛澤東主持會議並代表政治局做了重要報告。會

議確定了將黨的工作重心從鄉村向城市轉移的重大決策。根據毛澤東的報告和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中央決定，城市工作的中心就是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由中共華北中央局發行的《人民日報》3月25日以頭版頭條整版篇幅報導了七屆二中全會決議。這篇報導完整地闡述了毛澤東的城市工作思想，許多地方直接引用了毛澤東的講話。在此，有必要摘錄報導裏的關鍵段落，呈現原汁原味的修辭，使我們對當時中共中央城市問題的整體性認識及其城市工作方針的內在邏輯有更為貼切的理解^①：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着重地討論了在現在形勢下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的問題。……從現在起，從新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全會指出：我黨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領導城市人民進行勝利的鬥爭，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全會認為：管理和建設城市的中心關鍵是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第一是公營企業的生產，第二是私營企業的生產，第三是手工業生產。城市中的其他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的建設工作、工會工作和各種民眾團體的工作、治安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等，都應當為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這一個中心工作而服務。全會號召全黨同志用全力學習工業生產的技術和管理方法，學習和生產有密切聯繫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並且發出警告說：如果我黨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麼，黨

和人民就將不能維持政權，就會站不住腳，就會要失敗。

3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的重要社論，強調了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毛主席和我黨中央又指示我們：必須一反二十年來的做法把先鄉村後城市的做法，改變為先城市後鄉村的做法。如果我們不能把城市工作做好，使城市起領導鄉村的作用，那就不可能使農村有進一步的發展，也就不可能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而人民革命政權就不會鞏固，中國人民就還不可能做到徹底翻身。」社論又指出：「怎樣才能把城市工作做好？怎樣才能使城市起領導鄉村的作用？中心環節是迅速恢復和發展城市生產，把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②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的最後，提出了著名的「糖衣炮彈」理論。他警告說：「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着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③對於這支以農民為主的軍隊來說，進城——進入資產階級的城市——是一場新的硬仗，打不好的話會前功盡棄。七屆二中全會為中共的進城做了思想和理論上的準備。

概括而言，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為基礎對城市問題所作的闡發，核心是對城市的控制和利用：首先，城市的領導權必須轉移到工人階

級政黨手中；其次，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工業生產。城市作為人類聚居方式的所有特性都是次要的考慮，都必須圍繞上述兩個核心來安排。這一城市思想指導了此後數十年中國的城市政策和實踐，形成了一種沒有城市化、某種程度上甚至是逆城市化的工業化模式。這一模式形塑了共和國早期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樣式，直到改革開放時期才開始轉變。下文擬以上海和北京為例，對這一模式作一些具體的考察。

三 上海的城市規劃

作為一個在農村根據地成長壯大的革命政權，城市規劃對於中共領導下的新國家來說是一個新的領域。由於缺乏經驗，建國之初的十年裏，中共的城市規劃草案主要出自蘇聯城市建設思想或依靠蘇聯專家，尤其是北京和上海的規劃。在上海，城市規劃在新政權從國民政府留守人員手中完成接管之時就開始了，第一份重建和發展上海城市的草案〈關於上海市改建及發展前途的問題〉產生於1950年3月，是在蘇聯專家巴萊尼柯夫(M. G. Barannikov)的指導下完成的。根據這份草案，城市改造的主要目標是將上海從一座消費城市轉變為生產城市。上海市政府清楚地指出，城市建設要為工業生產和工人階級的需要服務^⑭。

在接下去的十年裏，產生了一系列城市規劃草案。在將消費城市轉變為生產城市的指導思想下，在這些不同版本的城規文件裏，工業規劃總是佔據了中心位置，與之配套的工人住房則是第二重要的考慮。這些規劃

的一個基本考慮是使工人的生活區接近生產區，以便使交通和其他成本最小化，從而最大化工人的生產力^⑮。上海市規劃建築管理局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建設工業衛星城的設想，在此前後已在南郊的閔行鎮搬遷和新建了一批重工業企業，包括上海汽輪機廠、上海電機廠、上海重型機器廠、上海鍋爐廠等^⑯。1958年底，為了安置激增的人口，號稱「閔行一條街」的生活、商業、娛樂綜合街區設想提上了日程。次年3月，建設規劃得到批准，一期的工人住宅4月破土動工，10月國慶節前建成^⑰。1963年，第一個衛星城在閔行宣布建成。「閔行模式」隨後迅速在環繞着市區的衛星城和眾多區縣被複製，陸續建成了閔行、吳涇、安亭、松江和嘉定等七個衛星城和圍繞着市中心近郊的十個工業區^⑱。1970年代，中共中央決定利用日本援助的技術和資金，在上海南面杭州灣邊上的金山縣建設一個新型石化城，北邊靠近長江出海口的寶山開建一個現代化鋼鐵基地^⑲。

到1970年代末，上海的工業體系已經基本成形，由散布在老城區滬西和滬東的紡織食品等輕工業、圍繞市區的十個專業工業區、沿江浙邊界七個衛星城和南北兩翼伸展開的金山石化廠和寶山鋼鐵廠組成，成功建成了一座巨大的工業城市。在此期間，上海貢獻了相當一部分的國民總收入和中央政府六分之一的稅收^⑳。

作為中國最大工業基地的上海，在提供配套的、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生活設施方面卻處處顯得資金不足，捉襟見肘。在大規模建設工業區和衛星城的同時，上海舊城區也面臨着人口增長、住房嚴重短缺的頭疼問題^㉑。民國時期上海的工業是以民族資本和

外資為主的紡織、服裝、食品、日用品等輕工業，與市中心相鄰的滬西、滬東都是工廠區，也是絕大部分勞工的居住區。臨時搭建卻成了工人長久居所的棚戶緊挨着連成片，擁擠不堪，人稱「滾地龍」。在新政權的階級話語裏，滾地龍是舊社會工人階級受剝削和壓迫的象徵，消滅滾地龍、讓工人階級住進體面舒適的新樓房是新政府的承諾^②。「二萬戶」是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規劃，是一種上下兩層的住房，1950年代初共建造了約二千幢，可供二萬戶家庭居住，著名的曹楊新村就是於1951年建成的第一批工人住宅。這種集住宅、商業、娛樂為一體的居住社區成為工業生產與工人生活緊密結合的標準模式，沿用了整整四十年^③，直到1990年代才被住房商品化改革所逐漸取代。

然而，舊城區和城郊工業區新建的工人新村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遠遠不能滿足五十多萬勞工及其家庭的需要。很大部分1949年前住在棚戶裏的底層勞動者在幾十年裏仍然住在滾地龍裏。上海最大的棚戶區之一是位於閘北的蕃瓜弄，它在1965年12月終於完成了改造，拆除了稻草

木棚，蓋起三十一棟五層樓的鋼筋水泥樓房，安置居民近二千戶、近九千人^④。這在當時是被官方廣泛宣傳的重大成就，而事實上卻只是市政府棚戶區系統改造巨大工程的一個緩慢的開端。在上海老城區，隱藏在高樓大廈後面成片的棚戶區遍布全市，蕃瓜弄改造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仍有殘留。

住房問題尚且無法解決，城市老建築的維護、新設施的營造更是被普遍忽視。市中心區域在建國初期經歷了普遍的衰落，唯一大規模的城市建設是原跑馬場改造而成的人民廣場及新建的市政府大廈、中蘇友好大廈這些象徵性建築。民國時期留下的老城區裏保留了較好的住宅，包括大批的石庫門里弄、西式公寓樓和花園洋房^⑤。這些原屬中上層居民的住房在1949年後經歷了複雜的所有權變更，大多成為公共資源，遷入了許多住房困難戶。這些住宅由於人口壓力和缺乏維修，大多成了上海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的情狀，擁擠而破敗。

上海老城區和市中心的衰落，是與新政權的城市思想相吻合的。如前



上海最大的棚戶區之一蕃瓜弄在1965年完成了改造。(資料圖片)

所述，早在西柏坡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確定了城市工作的核心是將消費城市轉變成為生產城市，使城市成為工業化的引擎。「十里洋場」的老上海是資產階級奢華腐敗消費生活的典型代表，是社會主義生氣勃勃的生產城市的反面，這種資產階級的奢侈生活方式和消費文化必須加以肅清，才能將上海改造成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城市。因此，提高生產性投入、厲行節約、壓制消費，不僅是因為建國初期資金不足、物資短缺的實際情況，更是中共階級論城市思想使然。

1950年代多個版本的上海城市規劃基本上遵循了這樣的指導思想，在大力建設工廠和工人住宅的同時，忽視了市中心商業和住宅的維護和更新，壓縮了城市的商業空間。統計數據表明，這十年裏上海市政邊界大大擴張，相比1949年的636平方公里，擴大了將近十倍，到1959年達到5,910平方公里；其中，市區面積僅擴大了一倍，從82平方公里增加至145平方公里。市中心面積佔上海整個行政區的比例大大縮減，從1949年佔比13%，縮減到1959年的2.45%。與此同時，上海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從1949年的503萬增長到1959年的1,028萬（表1），絕大部分人口增長發生在

市中心以外的工業區。結果是，工業區大規模擴張的同時，商業和消費區大幅壓縮和衰落。上海這座曾經聞名世界的、號稱「東方巴黎」的資本主義消費城市轉變成為一座真正的生產城市。

中共對於上海的設想，也是對於社會主義城市的一般設想，簡單說就是一座大工廠。這個城市想像的核心是工業生產，其次是服務於生產的必要的勞動力的再生產。而屬資產階級性質的商業和消費，如果不能完全消滅的話，則必須壓制和改造。建國初期上海的城市規劃，基本上是工業規劃。工業化之外的大規模城市建設一直要到1990年4月，國務院正式宣布設立浦東經濟技術開發區和經濟特區後才開始。

上海城市和工業的規劃與成形用了整整十年的時間，反映了1949年後中共對城市工作艱難而複雜的探索過程。在這十年裏，上海的城市規劃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修改，從最早巴萊尼柯夫1950年的版本，到中共中央1959年批准的終稿，可以看到蘇聯城建思想，西方花園城市模式，發展、變化中的中共城市思想，上海本地專家的地方性考量等的表達和各種影響，是一個探索和試錯的過程。然

表1 上海市面積和人口變化(1949-1978)

年份	行政區面積 (平方公里)	市區面積 (平方公里)	全市人口(人)	市區人口(人)
1949	636	82	5,030,000	4,190,000
1959	5,910	145	10,283,900	5,870,000
1978	5,910	158	10,982,800	5,570,000

資料來源：上海行政區和市區面積變化的數據來自《上海城市規劃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城市規劃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頁89；《上海人民政府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人民政府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頁677。全市和市區人口變化數字引自上海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編：《光輝七十載：1949-2019上海歷史統計資料彙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9），頁48。

而，中央對上海數次送審的城市和工業規劃草案遲遲不予批准，是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反映了對規劃本身的不重視、對發展方針的不確定，以及對上海作為國家工業化領頭羊定位的猶疑。

雖然面臨這些不確定性，上海城市和工業的規劃工作仍在探索中進行，工業布局仍能相當有序地推進着。在此期間，一方面，上海市區的工業基本上順着民國時期留下的基礎進一步發展，同時開始了在閔行衛星城和各工業區等落戶的重化工企業的試探性局部建設；另一方面，上海也經歷了公私合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城市人民公社、大躍進、大煉鋼鐵等運動。1958年的工業大躍進、大煉鋼鐵等旨在趕超英美的激進運動嚴重打亂了國民經濟秩序，上海的鋼鐵業盲目發展，質量低下，設備損傷嚴重，並導致上海產業結構的嚴重失衡，工業生產發生了很大的困難^⑥。從11月開始，中共中央開始糾正大躍進運動中的問題，多次提出降低經濟指標，「壓縮空氣」，並開始經濟政策的調整，工業大躍進逐漸中止。1959年，伴隨着大躍進和大煉鋼鐵運動盲目決策的失敗教訓，中央終於批准並正式下發了上海第一部完整的城市和工業規劃^⑦。這一規劃在此後二十多年裏的實施和擴展，將上海打造成為中國工業化的龍頭，以及科學有序地推進工業化的模範城市。

四 北京的城市規劃

北京案例提供了一個有趣的對照，以一個不同性質城市的設計進一步證實了我們上面的論述。歷史性的

西柏坡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將首都定在北平。北京的定位首先是政治中心，是共和國首都，其次是文化教育中心，但也要成為北方的工業中心。將北京這樣一座古老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城市打造為生產城市，這個今天看上去頗為突兀的設想，在當時其實並不奇怪；對於毛澤東等領導人來說，幾乎是必須如此、自然而然的。一方面，如前所述，工業化是新政權城市工作的核心，城市從此承擔起領導新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重任，而北京作為首都義不容辭；另一方面，在國際冷戰格局中，城市的「減資興無」是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所要求的，資產階級城市與無產階級城市、也即消費城市與生產城市之間是尖銳對立的。在這樣的理論框架之下，社會主義國家城市的定義就是生產性的、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也就必須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城市。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裏，對城市工作的階級性做了明確的分析，指出：「在城市鬥爭中，我們依靠誰呢？有些糊塗的同志認為不是依靠工人階級，而是依靠貧民群眾。有些更糊塗的同志認為是依靠資產階級。……我們必須批判這些糊塗思想。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⑧為了增加首都的無產階級人口，首都的工業化不僅是需要的而且是必須的。正如毛澤東所說：「只有將城市的生產恢復起來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⑨工業化是新政權一個毋庸置疑的首要目標，而新首都必須以身作則地領導這個進程。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說，毛澤東如是表達了他的衷心願望：他希望站在天安門城樓

上「從這裏望過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⑳。

接下去的三十年，新北京就在這樣的指導下形成了。一方面，與上海不同，北京的老城區經歷了巨大的改變：天安門廣場大幅擴張；寬敞筆直的長安街，以及包括人民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革命博物館、民族文化宮等蘇維埃風格的十大建築都趕在建國十周年國慶前夜完成。煥然一新的北京城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新中國驕傲的象徵^㉑。另一方面，電力、機械、紡織、汽車製造、鋼鐵等工業迅速在城市中心以及邊緣地帶大力建設起來，原來工業基礎薄弱的北京很快形成了以冶金、石化、煤炭為主的工業體系，擁有了包括石景山鋼鐵廠（1966年改為首都鋼鐵公司）在內的現代重工業。結果是，雖然工業化程度不如上海，但北京在鞏固其至上政治地位和文化中心的同時，變成了一座實實在在的工業城市^㉒。

北京與上海相似，建國後至1980年，遵循先生產、後生活的方針，在住宅建設方面投入不足，跟不上人口的增長，居民住宅非常緊張。1980年，北京人均居住面積才達到1949、1950年的水平^㉓。城市居民住房擁擠和破舊的問題成為改革開放時期到來之前城市建設中的頑症。而北京的城市建設也因國家經濟困難，在1959年以後基本停滯。新一輪大規模的城市建設要等到新世紀來臨，尤其是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才重新開啟^㉔。

如果說上海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如天津、青島等沿海半殖民地城市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改造，那麼，北京所代表的行政中心加生產城市的類型則

代表了傳統中國行政都市的工業化轉型；按比例縮小，為長沙、西安等眾多省會城市所複製。這兩種類型城市工業化的過程，隱喻了中國現代化路徑的特色，即國家建設和工業化是最重要的驅動力，而不是城市化。

五 城鄉關係的歷史演變

根據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等美國第一代中國城市史學者的研究，帝制時代中國根據自然和人文地理，大致分成九大經濟地理區域，各自擁有一套從中心城市向周邊次級城市和地方集貿市場逐級輻射的區域經濟網絡，描繪了一幅區域性城鄉一體的圖景^㉕。傳統中國城市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行政中心和因貿易而集市的中心。也就是說，歷史上中國的城市是行政和貿易中心，不是生產中心，生產主要在鄉村進行。隨着近代西方的入侵和中國工業化進程的開展，中國被捲入大機器生產物品的全球貿易體系之中，遂有沿海城市的興起。上海、天津、廣州等城市顯然都具有兩重性：既是工業生產中心，又是現代商品、工業產品的交易和消費中心。隨着工業化和經濟重心向沿海轉移，城鄉一體的區域經濟格局破敗了^㉖。

1949年後，新中國聚全國之力推進工業化進程，城市和鄉村的發展均以工業化需要為考量。從城市的情況看，首先，沿海城市作為工業化的中心得到國家巨大的投入，但作為商業和消費中心又受到極大壓縮，以便將有限的資源盡可能地投入工業建設。其次，以北京為首，全國範圍內一批行政中心城市也將工業建設列為

首要任務，如鄭州、西安、長沙等省會城市紛紛成為地區重要的工業中心。再次，這一時期還見證了第三種城市聚居形式，也即新工業城。在1960至1970年代備戰備荒、大力建設三線工業時期，這些新工業城在內陸腹地如安徽、四川、貴州、甘肅等山區和邊遠地區大規模地建立起來。這些以工業為唯一目的的聚居區，因其人口聚集的密度和日常生活的貨幣化，宛如城市，但卻因商業的缺乏而與消費城市的繁華無關。

為了節約資源以建設工業，城市的人口和消費都必須最大限度地壓縮，盡可能地將非生產性人口疏散遷移到鄉村。為此，中共中央在1958年後建立起了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隔斷城鄉人口的自由流動，實行城鄉分治^⑤。在這一時期，由於國家的貧窮和資金的缺乏，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內，農民和農村承擔了向國家工業化輸血的沉重負擔，農業產出以公糧、稅費、勞務等形式轉化成資金和口糧。農民節衣縮食，供養了城市人口；城市裏的工人和勞動者同樣是節衣縮食，為工業生產作貢獻。1949年後的城鄉分治和城鄉差別，其實質是工農業分治和工農業兩大體系之間的差別，農民、工人和城市勞動者都為國家工業化做出了巨大的奉獻。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也許可以重新思考這一時期城鄉差別的性質。城鄉差別加劇的原因並非一般所認為的國家政策向城市傾斜。事實上，沒有證據表明國家青睞城市甚於鄉村。相反，如上所述，很多證據表明新政權在意識形態和實踐兩方面都反對資產階級的消費城市。中共取得全國勝利後對上海等沿海城市的保護，其實質是對其工業設施的保護，與此相伴的

是對資產階級商業的壓制。準確地說，新政權支持生產，而非支持城市；支持工業化，而不是商業意義上的城市化。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問題的性質並不是中共向城市抑或鄉村傾斜，而是一個新的政權試圖快速實現國民經濟的工業化轉型而同時向城市和鄉村索取資源。

六 結語：城市的回歸

回到本文初始提出的框架，歐洲先發國家現代化歷史中的三個變量——城市化、民族國家的興起、工業革命——依次出現，形塑了歐洲現代化樣式。在中國，帝制晚期仍然維持着城鄉一體的格局，城市並沒有如歐洲中世紀那樣成為挑戰帝制的強有力的異質因素。中國的現代化在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下發生，從一開始就是與近代國家建設緊密相連的。從晚清的洋務運動、官督商辦、官商合辦到民國時期民族工業和國家工業齊頭並進，再到共和國早期社會主義工業體系的建立，工業化進程與國家建設緊密互動，大部分時間處於國家經濟現代轉型的主導之下，而城市化卻發展緩慢，直到二十世紀晚期才開始被動提速。對比歐洲，可以說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是「沒有城市化的現代化」。

進入新世紀後，城市化首次作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戰略被提上日程，方始成為形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變量。2002年，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開，明確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鎮化水平，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⑥。這是中共第一次明確將城市

化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提上日程，改變了之前控制城市人口、規模乃至商業的一貫政策，中國的城市、尤其是大都市，繼唐代長安、宋代汴京和臨安、民國上海之後迎來了又一輪黃金發展時期。在新世紀的第一個二十年裏，京滬穗深等大都市起步邁向全球城市之列，武漢、長沙、西安、鄭州等一批省會城市拔地衝天，一批批中小市鎮也都煥然一新，城市成為中國經濟的領頭羊，世界矚目。

然而，不同社會在各自現代化始發時期所形成的格局對其現代化樣式的塑造有着先入為主的影響，樣式一旦形成，後期發展雖會不斷地調整，卻很難根本改變。西歐社會現代化進程裏，先行發生的城市化及其以法治、民主政治、市場經濟為核心的一套理念、制度、習慣、倫理，為之後民族國家的興起和工業化發展奠定了基礎，這三個變量逐漸磨合而形成了西歐現代化樣式。在中國，受到西方壓迫下倉促開展的現代化進程始終處在民族國家的主導之下，並且以工業化為主要手段；作為現代性重要元素的城市化不僅沒有先行發生，而且在二十世紀發展十分緩慢，大大滯後於民族國家建設和工業化發展。新世紀以來城市化的迅猛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主導下的經濟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並不是一個自發、獨立的歷史過程。城市化元素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始發階段裏十分微弱，甚至缺席，這一現實造成現代化三個變量之間的力量平衡和張力與西歐十分不同，形成了中國獨特的現代化樣式。而中共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城市思想和戰略，對中國城市化發展、城鄉關係的演變、中國現代化之道路及樣式，影響至為深遠。

註釋

- ① 參見阮清華、姜進：〈前言〉，載阮清華、姜進主編：《城戀鄉愁：二十世紀中國的城鄉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頁i。
- ②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21》（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21），國家統計局網，www.stats.gov.cn/tjsj/ndsj/2021/indexch.htm，2-6，「分地區年末城鎮人口比重」。
- ③ 〈有關城市史與中國現代轉型的思考——對話羅威廉〉，載張瑾主編：《「城市史研究的新疆域：內陸與沿海城市的比較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選編》（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頁31-37。
- ④ 董繼紅、賈森：〈中國城鎮化政策演變及其主要特徵〉（2020年9月5日），「中諮研究」微信公眾號，<https://mp.weixin.qq.com/s/qN0J0gVCb-jSym5hX8QOsg>。
- ⑤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人民日報》，2001年3月18日，第1版。
- 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人民日報》，1991年4月16日，第1版。
- ⑦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計劃綱要〉，《人民日報》，2011年3月17日，第1版。
- ⑧⑨ 參見阮清華、姜進主編：《城戀鄉愁》。
- ⑩ Simon Parker, *Urban Theory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Encountering the C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101.
- ⑪ 參見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⑫ 〈中共二中全會完滿結束 毛澤東主席向全會作工作報告〉，《人民日報》，1949年3月25日，第1版。
- ⑬ 〈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人民日報》，1949年3月17日，第1版。
- ⑭⑮⑯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

載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二十六卷（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頁152；142；143。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上海城市規劃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城市規劃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頁23、88-90；95、183-85；103、182；206-10、214-15；127；566-67；512-14、526；567-69；95-101。

⑯ 參見《上海城市規劃志》，頁91、94。同樣的考量也可以在諸如1920年代德國的新法蘭克福項目（The New Frankfurt Project）和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底特律的福特主義（Fordism）這樣的西方工業城市規劃中看到。

⑰ 閔行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閔行區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www.shtong.gov.cn/newsite/node2/node4/node2249/node2251/node2255/index.html。

⑱ 參見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鄧小平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221。這是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但很難找到最原始的資料出處。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在這本書裏的說法應該是有根據的。根據《上海財政稅務志》的數據，1960至1984年間，上海市上解中央的稅額基本上在85.44%至95.02%之間波動；1959至1990年間，上海歷年上解中央財政的數額佔了全國財政總收入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參見王渭泉主編：《上海財政稅務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頁69-70、90。

⑳ 《上海通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通志》，第五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3556-61。

㉑ 參見孫詞雄：〈「大躍進」時期上海鋼鐵工業的回顧與思考〉，載當代上海研究所、上海市地方史志學會編：《當代上海研究論叢》，第一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www.shtong.gov.cn/node2/n86868/n87612/n195896/n195913/index.html。

㉒ 鄧琮琮、張建偉：〈曾經的古城〉，《中華建築報》，2008年4月12日，第3版。

㉓ 參見Wu Hung, *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5), 108-26。

㉔ 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工業卷綜述〉，載《北京志·工業卷·黑色冶金工業志有色金屬工業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頁2-4。

㉕ 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北京志·綜合卷·人民生活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頁312-17。

㉖ 參見薛鳳旋、劉欣葵：《北京：由傳統國都到中國式世界城市》（香港：三聯書店，2014），頁123、190、263。

㉗ 參見Frederick W. Mote, "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Form, 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 *The Rice University Studies* 59, no. 4 (1973): 35-65；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主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

㉘ 戶籍制度在1978年改革開放時期市場化的衝擊下逐漸鬆動，如今城鄉之間人員的自由流動已經實現。戶籍制度仍然沒有正式廢除，但在很大程度上已蛻變為一種地方福利制度，在子女讀書、宅基地等權利和養老金、醫療保險等福利方面，城鄉戶籍之間均有不同，利弊互現。何以如此的原因非常複雜，無法在此處細究。相關研究參見王海光：〈中國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建立〉，載華東師範大學當代史研究中心編：《中國當代史研究》，第二輯（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頁3-48；〈中國城鄉二元制度出台的背景分析〉，載《時過境未遷：中國當代史采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頁3-22。

㉙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02年11月18日，第2-4版。

姜進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歷史系及上海史研究中心教授。